

中國古文學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纪年（下）

刘 乃 和

（三）中历西历

中历，一般称为阴历，亦称夏历或农历；西历，一般称为阳历，即现在通行的公历。西历称阳历尚可，中历称阴历，则不确切。因为就历法来说，虽然格式不同的历法很多，但按其本质来分，共有三种，即阳历、阴历、阴阳历。

阳历，全称太阳历，是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为一年而制定的历法，今国际通用的公历，即是阳历。阴历，全称太阴历，是根据月球绕地球运行的周期而制定的历法，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即所谓回历，就是阴历。阴阳历的特征是：既重视月相盈亏的变化，又照顾寒暑节气，年、月长度都依据天象而定。我国一般称为阴历的历法，其实是阴阳合历，即今所说的中历。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阳历，是自罗马大政治家儒略·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开始的。这个历法，是在埃及历学的基础上改订的罗马历法。因为是儒略·恺撒决定采用，故名为儒略历。此历自罗马709年1月1日实行，这一年是公元前46年，亦即中历汉元帝初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儒略历原定：每隔三年一闰，平年365日，闰年366日，每月

天数，逢单月大，逢双月小，即每年的1、3、5、7、9、11月各三十一天，4、6、8、10、12月各三十天，但双月里的2月平年二十九天，闰年三十天。也就是平年里六个月三十一天，五个月三十天，2月二十九天；闰年时，六个月三十一天，六个月三十天。

实际太阳一周天（即回归年，也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长365.2422日，即365日5小时48分45.6秒。约长365又 $\frac{1}{4}$ 天。

儒略历平年365天，每隔三年一闰，即第四年为闰年，为366天，这是用以较恰当的调整每年的差距。

但实际实行以后，把“每隔三年一闰”，误为“每三年一闰”，即原来应第四年闰，误为第三年闰。则积三十六年应闰九天者，已闰十二天，多闰了三天。

儒略·恺撒死后，奥古斯都（Augustus）即位，发觉了这个错误，乃下令连续十二年不置闰，以纠正之。并且改定1、3、5、7、8、10、12七个月各31天，4、6、9、11四个月各30天，2月平年28天，闰年29天，每四年一闰。这就是奥古斯都修订的儒略历，后来一般称之为旧历。

此历一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自公元前46年积累到16世纪末，春分日由3月21日提早到3月11日。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Ⅲ）时，又因历法不合，命人重新修订，乃于1582年10月4日命令以次日，即10月5日，改为10月15日，中间削去十天。为了避免以后积累计算误差，置闰的法则改以公元纪年为标准：每四年一闰，逢百之年不闰，逢400年仍闰。即公元纪年被4除尽的年为闰年，但逢百之年中被4除尽也不闰，只有能被400除尽的才闰。例如1582年后逢百之年中能400除尽的1600年、2000年闰，不能被400除尽的1700年、1800年、1900年不闰。闰年仍为2月份增加一天。这就是格里高利历，又称新历。

儒略改历以前，历法很乱，儒略改历以后，因为错误地置闰有三十多年，不置闰又十余年，当时每月的天数又和后来不一样。一直到这次1582年改用了新历，世界各国的历法才逐渐一致起来。但此新历推算仍未尽善，每隔3323年仍相差一日。

在新历刚刚制定后，欧洲各国使用新历也是先后不同，大抵天主教各国最先使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波兰等国使用较早。到公元1700年后，耶稣教各国始采用。英国始用于公元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以其旧历9月3日为9月14日；日本始用于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以日本明治五年12月3日为明年1月1日；俄国始用于公元1917年。1917年俄国旧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即废除旧历，改用公历，以10月26日为11月8日，中间削去十二天。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在11月7日而称为“十月革命”，就是因为改历的缘故。

自从1582年格里高利修订历法后，这个历法逐渐被很多国家采用，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国通用的公历纪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历、公元。

这个历法虽称为公元，但公元的开始，却是在公元527年，即我国梁武帝普通八年，也就是大通元年。这一年罗马教士推定耶稣生年，就把传说中耶稣诞生这年作为公历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元年，相当于我国汉平帝元始元年。耶稣诞生前为公元前，耶稣诞生后为公元后。公元前一年的次年即为公元元年，这两年是相连的。虽然耶稣是宗教传说中的人物，但这个纪年的标准已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公认。从这年算起，一直传到现在的一千九百八十多年。

我国辛亥革命前，天主教书籍已偶有用公元纪年的，辛亥革命后，社会上使用公元的渐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采用公元纪年，并在1954年9月公布的宪法规定公元纪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方法。

我国历史上，自从有了年号后，都采用年号纪年，当时起了方便的作用。所以赵翼在《陔余丛考·年号重袭》条说“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的话。但是用年号纪年，不容易看出时代的前后，如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和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只看年号纪年，不熟悉历史的人，看不出谁在前谁在后；而且提出两个年号纪年，不能知道中间相差多少年，如果一年两个年号，如唐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大历，永泰二年（766）即大历元年（766），很容易误为两年。为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工具书可供查对，如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文物出版社编《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等。知年号纪年可查出公历，知公历纪年可查出我国历史上的哪朝、哪个年号多少年。但若想对以上所提的几种情况，能使人一目了然，最好在写我国历史文章时，在年号纪年之后，注明公元纪年。

但年号纪年后注公元纪年，有些问题也需要注意。即：我国从古代到清朝都是用中历（即阴阳历，俗称阴历，或称夏历、农历），以中历的某年相当西历（即公历）的某年，实际上，只能说是大体相同，可以对算，但并不能每年都齐头齐尾。往往中历年末已是西历的下一年年年初，即西历岁首在中历前一年岁末，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如今年（中历癸亥年）春节，是西历1984年即明年2月2日，相差三十二天。

历史上也是如此，所以中西历对算时，要注意中历年末已是西历次年年初这个问题，不然就易发生错误。

现在普通的年表，多只有中西历年的比照，而无月、日，如果仅据这类年表，中西历往往差误一年。下面举几个例子：

宋苏轼（字东坡），生在仁宗景祐三年，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按一般年表，景祐三年是西历1036年，本无问题。但苏东坡的生日是这年的十二月十九日。这年中历十二月初一日是西历1036年12月21日，则中历十二月十九日已是西历1037年1月9日

了。所以苏轼生卒年应为1037——1101年。《辞海》无误，《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误为1036年。

南宋陆九渊(字象山)，生在高宗绍兴九年，死于光宗绍熙三年。按一般年表，绍熙三年是西历1192年，本无问题。但他的卒日是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这年中历十二月初一日已是西历1193年1月5日，则中历十二月十四日是1193年1月18日。所以陆九渊生卒年应为1139—1193年。《辞海》无误，《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误为1192年。

清初施闰章(字愚山)，生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按一般年表，万历四十六年是西历1618年，本无问题。但他的生日是这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年中历十一月初一日是西历1618年12月17日，则中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已是1619年1月6日了。所以施闰章生卒年应为1619—1683年。《辞海》、《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皆误为1618年。

反之，世界史中历史人物，其生卒年在西历一、二月者，如以中历记之，常常是在前一年的十一、二月。

太平天国革命，金田起义是清道光三十年。查一般年表，道光三十年是西历1850年，但起义日期如果按十二月初十日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已是西历1851年1月2日，则十二月初十日是1851年1月11日。所以金田起义日期，如按十二月初十日之说，则西历应是1851年(如按十月初一日或十一月初十日说，则无此问题)。

据严璩编《侯官严先生年谱》记载，严复生于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咸丰三年为西历1853年，是年十二月初十日为1854年1月8日。

据章炳麟自编《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记载，他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同治七年为西历1868年，是年十一月三十日为1869年1月12日。

以上的例子，是历史人物的生卒年在岁首岁尾中西历对算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这类问题，在写其他文章中历注西历时也应注意。

如，1978年4月14日《光明日报·文物与考古》第80期上，载有《从东晋孟君墓志看我国书体的演变》一文。这篇文章以马鞍山市出土的东晋《孟君墓志》的字体，说明当时已有楷体书，并用来作为《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书的例证材料。其志文作：“太元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晋故平昌郡安丘县始兴相散骑常侍孟府君墓”，此文中说墓主人在“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元年（公元376年）死去。”太元元年虽是西历376年无误，但今年十二月十二日则已是西历377年1月7日了。

现在计算年龄时，有时还会遇到这类问题。198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所刊载的《宋庆龄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中有：

宋庆龄同志，原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农历为壬辰年十二月十日，按中国的习惯算法，现年九十岁）。她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她十五岁的时候，到美国佐治亚洲梅肯的卫理公会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上学，……

农历壬辰年为西历1892年，这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一日是西历1893年1月18日，则十二月初十日是1893年1月27日。就是说宋庆龄的农历生辰是以西历算的前一年。“按中国的习惯算法”即生下来算一岁，过第一个年就算两岁。这就是说按壬辰年，又按中国的习惯算法，“现年九十岁”，如果按西历则为八十八岁。文章后面写“1908年，他十五岁的时候”等，就是按西历，⁶又按诞生后满一年算一岁的算法，即现在习惯说的“实足年龄”。

此外，不是岁首岁尾，也要注意用中历、西历记载时的年月日。

如李大钊同志诞生的年月日，过去就因为未查明中历是公历的哪一年，1933年所立的李大钊墓碑，就是用西历纪年，而用中历

纪月日。李大钊婿贾芝同志《关于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见1979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一文中说：

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按照一九三三年所立的墓碑的记载，为“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这个日期，据李星华同志说，是根据她母亲（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的记忆。光绪十五年为公历一八八九年，所以过去一些书刊中将李大钊同志的诞生年月记载为，“一八八九年十月六日”。我过去的文章里也是这样写的。

这就是说李大钊的出生年用的西历，而出生日用的是中历。光绪十五年是1889年，这年十月初六日为西历10月29日。这里虽没有岁首岁尾的差异问题，但年月日不按一种历法写也是不恰当的。后来经过考证，于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已将李大钊同志的诞生日期订正为1889年10月29日（中历十月初六日）。

《人民日报》1981年7月5日刊有杨成绪《在“伟大的道路上”上》，副题是《追寻朱德同志在德国的踪迹》。文中有：

离开普朗克街，穿过一条条树荫掩映、用方石块铺修的街道，来到了哥廷根大学办公大楼。当年朱德同志曾经在这里办理过入学注册手续。在入学注册证上，朱德同志端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填的是1885年11月6日（实际应是1886年旧历11月6日，可能是当时误写了）。

过去一般都用中历生辰日期，朱德同志当时也写的是习惯用法，填写生辰是用的中历十一月初六日。现在我们按此文中所说的“1886年旧历11月6日”，准确的写法应是公元1886年12月1日。

以上是中历、西历的换算问题。

我国古代的历法，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将全年划分为二十四个段落，其中有十二个“中”气，十二个“节”气，统名为二十四节气，又名二十四气。

二十四节气表明气候的变化和农业生产的季节。它是根据

“日躔”即太阳周期来推定的，与月亮的望晦弦朔没有关系。所以节气在西历中，日期有定，前后所差不出一二天；但在中历（农历），则往往有差二十八、九天者。节气的名称、所在的季节和西历月份是：

春季	立春	节气	2月
	雨水	中气	
	惊蛰	节气	3月
	春分	中气	
	清明	节气	4月
	谷雨	中气	
夏季	立夏	节气	5月
	小满	中气	
	芒种	节气	6月
	夏至	中气	
	小暑	节气	7月
	大暑	中气	
秋季	立秋	节气	8月
	处暑	中气	
	白露	节气	9月
	秋分	中气	
	寒露	节气	10月
	霜降	中气	

冬季	{	立冬	节气	} 11月
		小雪	中气	
		大雪	节气	} 12月
		冬至	中气	
		小寒	节气	} 1月
		大寒	中气	

其每月在西历的日期，大体是：上半年在6日、21日；下半年在8日、23日。今年（1983年）的清明在4月5日，谷雨在4月20日；立冬在11月8日，小雪在11月23日。

在我国不少古籍中，很早就有二十四节气的记载，《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已较完备，两《汉书·律历志》里都记载得更为明确。

中历的闰月，在汉武帝太初改历前，都置于一年的最后。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所以闰月都是在九月后，称为“后九月”。太初改历后，历法日臻精密，闰月的安排也有了新的规定，就是把没有“中”气的月份做为闰月。这个置闰办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未变。比如明年（1984年）中历是闰十月，因为一个月只有节气大雪，是在闰十月十五日（西历12月7日），没有“中”气。下一个“中”气是冬至，是在下月也就是十一月初一日（西历12月22日），因此定十月为闰月。这个精确的置闰方法，《汉书·律历志》卷下有明确记载：

……以十二除之，至有闰之岁，除十三入章。三岁一闰，六岁二闰，九岁三闰，十一岁四闰，十四岁五闰，十七岁六闰，十九岁七闰。

西历闰年只比平年多一天，中历闰年比平年多一个月。因为中历是用的阴阳历，阴历以月亮为准，是利用自然现象，阳历以太阳为准，是用人造的置闰以平衡年的日数，以便于按季节进行农业生产。为了把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很好地协调起来，我国很早

就创造了十九年七闰的办法，这也就是我国的相当精确并且和天象符合的阴阳历。

我国历法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上就有了关于“日至”的记载。“日至”就是以日影的长短来观测四季的变化。在《周礼·地官司徒》上已有用测日影的方法来进行天文观测的记载，而且是很精确的记载，其中说：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古人在多年测量观察的基础上，确定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是地中。相传周公营东都洛阳时，曾在这里用土圭测日影，后来许多朝代都派遣天文官到这里进行天文观测。现在登封的周公测景台，虽然是唐人刻建，但它保存了古代圭表测影的遗制。圭和表呈垂直角度，圭的设置和当地子午线相重合，用以观测每天日中日影的长短变化，从而找出季节的变化。把表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就是在相当于每年西历12月22日前后，太阳到达黄道最南的那一点，这天地球北半球的白天最短），把表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夏至（就是在相当于每年西历6月22日前后，太阳到达黄道上最北的那一点，这天地球北半球白天最长）。古人因为冬天日影长而日在北，所以把冬至又叫“日北至”，夏天日影短而日在南，所以把夏至又叫“日南至”。

把一年里的日中日影最短的一天到下一年日中日影最短的周期（即地球绕太阳一周），或把一年里的日中日影最长的一天到下一年日中日影最长的一天的周期，定为一年。也就是从冬至到冬至、从夏至到夏至是一年。

在一年里，把两个日中影长相等、昼夜长短相同的日子，分别定为春分和秋分。这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出入》里所说的：

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阴日损而随阳，……
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就是一年中的二至、二分。冬至既定，则全年节气就可以递推，二十四节气都可以定下来了。

在《尚书·尧典》里，已记载了每年的天数、闰月和四季，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就说明我们祖先在很早就已定下一年的长度是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调整一年中的寒暑温暖四季。到后来，《周髀算经》里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卷下有：

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极影长，明日反短，以岁终日影反长，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岁终也，月积后天十三周，又与百三十四度余。

这就是说，后来又总结出新的观测经验，在连续四年的观测中，发现有三年的年长为三百六十五天，而另一年的年长为三百六十六天，所以得知一年的平均的长度，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后来经过多次改历，历法在原来基础上精确程度更不断提高。到元世祖忽必烈时，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因当时的历法《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已觉出有很多方面不甚准确，乃命郭守敬和王恂、许衡等，带着一批人开始修订历法的工作。郭守敬认为修订历法必须实地测验，测验应当首先准备测量的仪器。朝廷同意他的意见，开始行动起来。《元史》

164《郭守敬传》说：

守敬首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守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图高爽地，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相比复。又以为天枢附极而动，昔人尝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极仪。极辰既位，天体斯正，作浑天象。象虽形似，莫适所用，作玲珑仪。以表之矩方，测天之正圆，莫若以圆求圆，作仰仪。古有经纬，结而不动，守敬易之，作立运仪。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证理仪。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虽有明，察景则难，作阙几。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作星晷定时仪。又作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

郭守敬重在实践，所以制作了大量仪器，他又画了《仰规复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等，和以上各种仪器的观察互相参考。至元十六年（1279），他领导着监候官十四人，分道出去观测天象。他们“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踰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在全国各地观测后，记录下了第一手材料。

经过几年的仔细观测和精密计算，到至元十七年（1280），终于创制了一部新历，因古语“敬授人时”而定名为《授时历》。元朝政府在这年六月布告天下，决定在次年（1281）正月初一日施行新历。

《授时历》的创制，是我国历法的又一次大的改革。它的精确度很高，所定的数据完全是得自实地观测，自实践中得来。在这部新历中，确定了一系列新的天文数据，如确定一个月是29.530593日，一年是365.2425日（合现在365日5时49分12秒），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数仅差26秒，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相比，则分秒不差。而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颁行的，《授时历》则比它早三百多年。

我国历法的多次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辛勤劳动和精心研究所取得的，它不仅为我国天文学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并且是我国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最后附带谈两个问题。

称“年”称“载”的问题：

前些时，有某出版社的编辑过谈，他偶然说起：“最近拟发表一篇文章，文中‘年’字多误为‘载’字，作者未免粗心，徒增编

辑麻烦，只得替他一一改正。”问之，才知是写安史之乱的文章，我想那就不一定是作者写错了。听到这位编辑同志的意见后，又看到有的同志虽郑重的为此字作校记，而往往自己也没完全弄清楚历史上改“年”为“载”的起止年代。此事本细小，无关宏旨，但文献古籍中往往会遇到，因附带谈一谈这个问题。

中历年号纪年，在年号后面，都是用“年”字记数，如汉建安三年，唐贞观十年等。但记年数的后面也有不称“年”而称“载”的。这就是唐玄宗天宝年间，自天宝的第三年（744）正月初一日开始，至肃宗至德的第三年（758）二月初五日之间，称“载”不称“年”。共历十四年又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段纪年是：玄宗天宝元年，二年，三载，四载……，十五载（756）七月肃宗即位，改为至德元载（仍为756年），以后是二载、三载，至三载（758）二月初五日改为乾元元年（仍为758）。《旧唐书》九《玄宗纪》记叙此事：

天宝三载，正月丙辰朔，改“年”为“载”。

“丙辰”误，应为丙申，《新唐书》不误。又，《旧唐书》十《肃宗纪》：

至德三载，二月丁未，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

《通鑑》卷215、卷220，都记有此事：唐玄宗天宝三载“春正月，丙申朔，改年为载”。唐肃宗至德三载“二月丁未，改元，复以载为年”。注曰：“改年为载，自上皇天宝三载始”。

当时人都称载，今存的唐人写的史书、诗文、诏令等皆如此。《唐大诏令集》、《唐会要》、《全唐文》及其他很多书中，随处都是。今仅举李白、杜甫诗证之：

李白有《赵公西候新亭颂》文，第一句为“惟十有四载，皇帝以岁之骄阳”。这是赵悦于天宝十四载到宣城为太守时李白所作，文中称“载”不称“年”。

杜甫《北征》五言古体长诗，开始几句是：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杜甫在至德二载（757）四月，由长安贼中潜至凤翔投肃宗，八月回鄜州探望家小，这首诗是回鄜州后追叙回家的经过所作。事在肃宗二载，这年是闰八月。初吉，朔日，即初一日。因这诗主要是写国家大事，所以一开始就抬出皇帝，并写明年月日。“皇帝二载”即谓当时是至德二载（757）。

杜甫有《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北门，有悲往事》一首，诗题中即用至德二载。

当然我们现在写这一历史期的文章时，用“年”不用“载”，对文章内容并无影响，但如果作者已写“载”字，别人却也不必都一一为他改为“年”字，这一改反是以误改正了。而且严格说，仍以用其当时称法为是。事实上，很多人是注意了这个问题的。当然，也有人对此并不计较。今举数例为证：

《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三期，刊有《杜佑和〈通典〉》一文，其中有：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唐皇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这里就是按其当时的称法，用“载”字。

又如《辞海》对是“载”是“年”，也多所注意。在李白、杜甫两条，关于李杜在洛阳结交事，都用“天宝三载”。此外，高仙芝、唐玄宗、杨贵妃、杨国忠、安禄山、安史之乱等条，都是应用“年”处用“年”，应用“载”时用“载”。但《辞海》也有未注意此事的词条，想是因书成众手，未能统一。如唐肃宗条，有“天宝十四年”、“至德二年”、“宝应元年”三次纪年，则无论应用“年”用“载”，皆一律用“年”。

也有知道天宝年间曾改称“载”，但不知其改称的起止是何年。如：浙江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娱乐》1980年第五期刊有《贺

知章的故乡在哪里?》一文，文中有：

据史书记载，天宝二载（公元743年）十二月，贺知章（字季真）得病，……天宝三载（744）正月，唐玄宗准许他的请求，……。

其中“三载”写对，“二载”则其时尚未改，应称“二年”。

日本受中国影响，这段时间也曾一度改“年”为“载”，但时间很短。

日本学者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如日人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是一本记载鉴真和尚事迹最多的文献。汪向荣校注本已于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校注注意了我国称“载”还是称“年”的问题。如第40页原文有：“是岁，唐天宝元载冬十月时，大和上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汪注曰：“天宝元载，应作天宝元年。”其第43页、51页有：“是岁，天宝二载癸未，当时海贼大动繁多，台州、温州、明州海边，并被其害，……。”“天宝二载十二月，举帆东下。”两处都有汪注，曰：“天宝二载，应作天宝二年。”这都是原书写错，汪注校正者，可见对此字的重视。其57页，原书有：“天宝三载，岁次甲申，越州龙兴寺众僧请大和上讲律受戒。”汪注曰：“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十六年。由本年起改年为载”。何年改“年”为“载”，所注准确。原书以下又有天宝七载、九载及两处十二载，都无误。

书后附有汪著《鉴真年表》，其中前面有天宝元年、二年、三载、四载，至十三载，都写得准确。只是到天宝十四载以后，改写为“天宝十四年”、“至德元年”、“至德二年”，则是错的。

也有根本不管改“载”之事者，如《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有几十次应称“载”处，以及最后所附《李白杜甫年表》中，一律称“年”。引《旧唐书·永王璘传》中有“天宝十五载”句，括号内则注成“即肃宗至德元年”，是引文用“载”，注文不用之例。且有《通鉴》原作“至德元载”，引用时亦改为“至德元年”之

处。

今人文章，不外以上所举的：完全准确按当时称法的；半按半不按的；全然不管历史上曾改称“载”的三种情况。

韵目代日问题：

我国于使用电讯以后，在电报上常用一个特定的字来代替这天的日子，这个字就是作诗时所用的诗韵的标目。因为汉字分为平（上平、下平）、上、去、入四声，每一声分为若干韵，每一韵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韵的目，称为韵目。用这个字代替日期就是韵目代日。四声的韵目是有一定数字和固定次序的。通常用的韵目是金朝的官修韵书，分一百零六韵的《平水韵》（另一种是分一百零七韵者），即元、明、清以来作诗用韵的依据。这个韵，上平、下平声各十五，上声二十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

今列表于后：（见262页）

代日通常用韵目中的上平声十五个字，就是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十五删；接上声第十六至廿九个字，就是十六铣、十七篠、十八巧……二十九赚；再接去声第三十个字，即三十陷，来代表三十天。有时也用下面一个韵目的字，即表上每一栏的第二个字来代替，如二十九日为赚字，也有时用艳字。又因为韵目四声中没有三十一，而大月有三十一日，所以用“引”或“世”字代替这天，这是因为“引”字和阿拉伯数字“31”合写的形相似，“世”字和汉字“卅一”直写的形相似，这两个字不是韵目。下面举几个例：

1927年“4·12”后，反动派何键、许克祥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21日的韵目代日是“马”字，所以史称这次事件为“马日事变”。

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29日发出通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29日的韵目代日是“艳”字，所以史称这个通电为

	上平 下平 上 去 入		上平 下平 上 去 入
一日	东、先、董、送、屋	十七日	篠、霰、洽
二日	冬、萧、腫、宋、沃	十八日	巧、嘯
三日	江、肴、讲、绛、觉	十九日	皓、效
四日	支、豪、纸、寘、质	二十日	舒、号
五日	微、歌、尾、未、物	二十一日	马、箇
六日	鱼、麻、语、御、月	二十二日	养、禡
七日	虞、阳、驥、遇、曷	二十三日	梗、漾
八日	齐、庚、荠、霁、黠	二十四日	迥、敬
九日	佳、青、蟹、泰、屑	二十五日	有、径
十日	灰、蒸、贿、卦、药	二十六日	寝、宥
十一日	真、尤、軫、队、陌	二十七日	感、沁
十二日	文、侵、吻、震、锡	二十八日	俭、勘
十三日	元、覃、阮、问、职	二十九日	賺、艳
十四日	寒、盐、旱、愿、緝	三十日	陷
十五日	删、咸、潜、翰、合	三十一日	引、世
十六日	铎、谏、叶		

“艳电”。

在革命历史文献里，也有时会遇到用韵目代日，如：

1981年7月9日，在《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写的四篇新闻稿，其第四篇为1949年4月24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最后录有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电报全文，最后用“梗四”

二字。其中的“梗”字，就是韵目代日的二十三日。“酉”字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干支纪时，酉是下午五时至七时。“梗酉”即说这个电报是4月23日下午五时至七时之间拍的。

今年（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于3月2日在《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一组书信，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于1949年1月19日给宋庆龄同志的电报，最后用“子皓”二字。其中“皓”字，就是韵目代日的十九日。“子”字是指一月。这里是用子、丑、寅、卯……十二地支代表西历的1至12月，与过去用“建寅之月”“建卯之月”代表中历的正月、二月不同。

用韵目代日主要是为了拍电报可省字省事，几个字用一个字就代替了。现在虽然使用不多，但看历史材料时还有时会遇到，一并附此。

1983年12月写于补拙书室

